

蒙哥汗死因新探

李天鳴

一、前言

宋理宗寶祐六年（元憲宗八年，一二五八），元憲宗蒙哥汗大舉南侵。次年（宋理宗開慶元年，元憲宗九年，一二五九）七月，蒙哥汗却在釣魚城下死亡。關於蒙哥汗致死的原因，自宋迄清，衆說紛紜，到如今尚無定論。目前，臺灣的學者或採病死之說【註一】，或採戰死之說【註二】——包括高中歷史課本在內【註三】。而大陸的學者則絕大多數都採戰死之說【註四】，並且早已在通史【註五】以及高、初中歷史課本中說蒙哥汗是負傷而死的【註六】。不過，儘管如此，正如鄧廣銘先生所說的，「蒙哥汗是怎樣死的？」到目前「仍是懸案」【註七】。

作者去年出版《宋元戰史》一書【註八】，雖然採取病死一說，但是並未作詳細考證。目前，作者對這個問題有了新的發現，所以撰寫本文，希望對這個歷史懸案的解決有所幫助。

二、蒙哥汗大舉南侵之役概述

蒙哥汗就任蒙古皇帝（宋理宗淳祐十一年，元憲宗元年，一二五一）以後，便準備對宋朝發動一個大規模的攻勢，企圖在一擊之下，將宋朝完全征服。寶祐六年，蒙哥汗大舉南侵之役正式開始。蒙哥汗的計畫是分成五路向宋朝進攻：

- (1) 蒙哥汗親自向四川進攻。
- (2) 皇弟忽必烈軍向鄂州進攻，攻佔鄂州之後，再沿著長江東下，進攻南宋的國都臨安。

(3) 親王塔察兒軍進攻荊山（懷遠），牽制淮西的宋軍。

(4) 兀良合台軍從大理向廣西進攻，預定和蒙哥汗在潭州會師。

(5) 益都行省李壇軍進攻淮東，牽制淮東的宋軍。

四川方面，蒙軍分成三路南下：蒙哥汗率領中路軍，沿着嘉陵江南下；親王莫哥都率領左路軍，穿越米倉關南下；都元帥紐璘率領右路軍，從成都南下。是年十月，蒙哥汗首先展開攻擊。十一月，紐璘從成都出發，並在十二月進到重慶東方的蘭市，架設浮橋，以圖阻止宋朝從東方所派來的援軍——舟師。三個月內，四川便喪失了十個州郡，包括北部的六座山城。次年（開慶元年）二月，蒙哥汗開始圍攻合州釣魚城（今四川合川縣東十二里）。

開慶元年正月，宋廷下令將樞密使、兩淮宣撫大使、兼知揚州賈似道調任為樞密使、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都大提舉兩淮兵甲、知江陵府，統一指揮京湖、湖南、四川的戰事以及救應四川的援軍。同年，賈似道又進駐到峽州，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呂文德等也率領宋朝的援軍逼近蘭市。

宋蒙兩軍在蘭市一帶對峙了七十日，最後，呂文德等擊敗了紐璘軍。紐璘又撤退到重慶東方二十里的銅邏峽。呂文德經過三次攻擊，終於擊敗了蒙軍，進入了重慶。然後，呂文德又率領舟師沿着嘉陵江北上，救援釣魚城。五月，呂文德在三槽山的東方擊敗了一支蒙軍；六月，又在三槽山的西方擊敗了一支蒙軍。

從是年二月開始到六月，每月，蒙軍都對釣魚城展開強攻；但是，在宋朝的興元都統、兼知合州王堅的堅守之下，蒙軍都攻打不下。而蒙軍由於水土不服，很早就開始有許多將士感染了疾病。六月，蒙哥汗本人也感染了疾病。到了七月，蒙軍中感染疾病的情形更加嚴重，於是，蒙軍中也起了班師的議論。而在這時，呂文德所率領的舟師，正從嘉陵江浩浩蕩蕩的北上，逐漸接近釣魚山。七月九日，蒙哥汗便下令留下精兵三千人監視釣魚山，其餘的蒙軍則全部交由河南經略使、萬戶史天澤指揮，前去迎擊呂文德的援軍。宋蒙兩軍在嘉陵江上的黑石峽（合州東南方）交戰，蒙哥汗也騎着馬站在東山上抱病觀戰。結果，史天澤運用蒙軍獨特的水陸協同三面夾擊水戰戰法擊敗了呂文德的舟師，並一直追擊到重慶城下才回軍。不久——七月廿一日，蒙哥汗却在釣魚山下去世。於是，四川的蒙軍便班師北歸。

在東方，開慶元年七月十二日，忽必烈軍抵達蔡州。八月十五日，忽必烈渡過淮河，開始入侵宋國，然後又通過大別山脈，進到鄂州附近的長江北岸。這時，京湖方面宋軍舟師的主力已經前往救援四川，鄂州一帶江面的守備比較薄弱。因此蒙軍使用臨時拼湊而成的船隊，便在九月三日的潯黃洲之戰，擊敗了宋朝的正規舟師，渡過了長江。然後，忽必烈便率領主力圍攻鄂州城，又分兵攻掠鄂州附近的地區。宋朝仍然實施舟師水路赴援戰略，從京西、四川、沿江等地抽調軍隊去救援鄂州，呂文德也從四川率領舟師返回京湖，進入鄂州固守。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賈似道也進駐到漢陽。十月二日，宋廷晉升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仍舊兼任宣撫大使等職。不久，賈似道又進入鄂州固守。十一月，鄂州城內宋軍傷亡慘重，賈似道秘密派人向蒙軍求和。不久，賈似道便奉命調離鄂州。

這時，忽必烈軍也已經有十分之四、五的人感染了疾病，而忽必烈也爲了返回北方爭奪帝位，因此決定班師，於是派遣趙璧進入鄂州同宋朝人會談。當時，賈似道的意思是，只要蒙古退兵，宋朝願意割讓長江以北的土地，並且每年繳納歲幣。但和議尚未商定，忽必烈便在十一月廿八日撤離鄂州。閏十一月廿一日，蒙軍全部撤離鄂州。

淮東方面，李璫攻陷了漣水之後，便停止前進。淮西方面，塔察兒圍攻了懷遠一百五十日，也解圍退走。在南方，兀良合台軍在是年八月侵入廣西，十月進入湖南，攻陷了永州、衡州，十一月開始圍攻潭州，最後也奉忽必烈之命而班師北歸。宋理宗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統元年，一二六〇）春天，宋廷派遣夏貴救援上流，夏貴率領舟師擊敗了留駐在白鹿磯（鄂州東北方）一帶的蒙軍殿後部隊，肅清了江面。蒙哥汗大舉南侵之役正式結束【註九】。

三、黑石峽之戰及蒙哥汗死亡的時間

在探討蒙哥汗的死因之前，對於蒙哥汗親征四川之役，必須先考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黑石峽之戰——卽史天澤同呂文德在嘉陵江上的決戰——的時間。

蘇天爵「國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引「家傳」說：

（開慶元年）夏，駐合之釣魚山。秋，疫作，方議回鑾。宋將呂文德帥艦千餘，蔽嘉陵江來犯，（蒙軍）逆戰不利。上（蒙哥汗）命公（史天澤）禦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總舟師順流縱擊，鉞鉅纜數百艘，追至重慶，三戰三捷。卒全師而還。【註一〇】

由上述可知，嘉陵江決戰是在秋季。

宋濂等「元史」卷一五四「李進傳」說：

己未（開慶元年）……夏五月，宋由嘉陵江以舟師來援，始大戰三槽山西。六月，戰山之東，（李進）有功。秋七月，宋兵戰艦三百餘泊黑石峽東，以輕舟五十爲前鋒，北軍之船七十餘泊峽西，相距一里許。帝（蒙哥汗）立馬東山，擁兵二萬，夾江而陣。（史）天澤乃號令於衆曰：「聽吾鼓，視吾旗，無少怠也。」頃之，聞鼓聲，視其旗東指，諸軍遂鼓譟而入，兵一交，宋前鋒潰走，戰艦繼亂，順流縱擊，死者不可勝計。帝指顧謂諸將曰：「白旗下服紅半臂突而前者，誰也？」天澤以進對，賞錦衣、名馬。【註一一】

由上述可知，兩者所述的是同一個會戰，即史天澤運用水陸協同三面夾擊水戰戰法擊敗了呂文德的黑石峽之戰（嘉陵江之戰），並且是發生在七月，而蒙哥汗也在東山上詳細觀戰。

「元史」卷三「憲宗本紀」九年條又說：

秋七月辛亥（九日），留精兵三千守之，餘悉攻重慶。癸亥（廿一日），帝（蒙哥汗）崩于釣魚山。

所謂「留精兵三千守之」，我的解釋是：留下精兵三千人監視釣魚城。而「餘悉攻重慶」則是指：其餘的軍隊全部到嘉陵江方面去對抗呂文德的援軍，並在黑石峽之戰擊敗了宋軍之後，一直追擊到重慶。「攻重慶」三個字，會使人誤以爲是蒙軍去攻打重慶城。其實，蒙軍並沒有去攻打重慶。

「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澤傳」說：

己未夏，駐合州之釣魚山，軍中大疫，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以艫艦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其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

蘇天爵「元文類」卷五八，王磐「史天澤神道碑」也說：

駐釣魚山。夏秋之交，軍士多疾疫，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率戰艦千餘艘，由嘉陵江來。上（蒙哥汗）命它帥拒戰，不能却，詔公（史天澤）往。公命蒙古軍分爲兩翼，夾江注射。公率水軍順流縱擊，大破之，奪船數百艘，追至重慶府乃還【註二】。

從上述可知，蒙軍只是追擊到重慶城下便回軍，並沒有去攻打重慶城。

綜上所述，可知黑石峽之戰發生在開慶元年七月，並在七月九日之後，七月廿一日之前。

但是，由於「元史」「史天澤傳」（見前引文）所述的黑石峽之戰，是繫在「夏」季之後。而最早一部關於宋元史事的編年史——元末陳桱的「通鑑續編」——也將是役記載在六月條下。「通鑑續編」卷廿三開慶元年條說：

六月，呂文德及蒙古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註三】

於是，以後關於宋元史事的編年史——商輅「續資治通鑑綱目」【註一四】、薛應旂「宋元通鑑」【註一五】、王宗沐「續資治通鑑」【註一六】、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註一七】、畢沅「續資治通鑑」【註一八】，以及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註一九】，都相沿這個錯誤，將史天澤同呂文德的嘉陵江之戰記載在六月條下。因而使得目前的許多著作，也誤將黑石峽之戰（嘉陵江之戰）記載在六月條下。

其實，由上文可知，黑石峽之戰是發生在七月九日至廿一日之間。

其次，再討論蒙哥汗死亡的時間。「元史」「本紀」說蒙哥汗死在七月癸亥（廿一日）。這本來是不會再有什麼問題的。可是，由於在開慶元年，蒙古的宣撫副使郝經在勸忽必烈的「班師議」中說到：「至于汝南，既聞凶計。」【註二〇】以及拉拖特「史集」說忽必烈在抵達淮河河邊時，已經獲知了蒙哥汗的死訊【註二一】。於是，韓儒林先生便根據郝經「班師議」以及「史集」而推斷說：「一二五九年陰曆七月十二日，忽必烈行至汝南淮河之濱，已得到蒙哥死于合州的消息。」因此，韓先生認為：由此可見，蒙哥汗死的時間必在七月上旬；「元史」謂（蒙哥）死于七月癸亥（二十一日）恐不可信。」

【註二二】

「元史」卷四「世祖本紀」已未條說：

秋七月甲寅（十二日），（忽必烈）次汝南……八月丙戌（十五日），渡淮。

汝南即蔡州（今河南汝南縣），在淮河的北方。從「元史」「本紀」可知忽必烈在七月十二日至八月十五日之間都在汝南一帶。李則芬先生說：

據「元史」「郝經傳」，世祖停留在汝南期間，「既聞凶訃」；然「世祖本紀」則說要到九月壬寅朔，親王穆哥（末哥，忽必烈之弟）自釣魚山所遣使者，始「以凶聞來告，且請北歸，以繫天下之望」。郝經之說雖嫌快了一點，仍有可能，二說不一定有衝突，因為蒙古驛道便捷，信息比使者先到，也是合理的。【註三】

我贊同李先生的說法。

波斯人拉施特（Rashid）（一二四七——一二八八）主編的「史集」說：

當時，忽必烈合罕……到了南家思（按：宋朝）地區一條稱為淮河的大河邊；當他聽到蒙哥合罕的噩耗時，他與霸都魯那顏商議，並說道：「（我們）不要理睬這些謠言！」【註四】

同書又說：

蒙哥汗……去世。忽必烈合罕在淮河岸上獲得他的死訊。他（忽必烈）與……霸都魯那顏進行了商議，（宣告道：）「我們率領了……（大）軍來到這裡，怎能因為謠傳便無所作爲地回去呢。」于是他進兵南家思境內。【註五】

在八月十五日忽必烈渡過淮河之前——即屯駐在汝南期間，忽必烈接獲蒙哥汗死亡的非正式的消息，是很合理的，而且也不會同蒙哥汗死在七月廿一日的說法互相衝突。忽必烈在汝南停留的時間超過一個月，因此，不必非要在七月十二日就聽到蒙哥汗死亡的消息。所以，實在不必將蒙哥汗死亡的日期推到七月上旬。

此外，屠寄「蒙兀兒史記」說，蒙哥汗死在七月「癸未」【註六】。按是年七月無「癸未」日，而且，以「蒙兀兒史記」的慣例，凡是與「元史」記載不同的地方，屠寄大都在夾註中說明原由，而本條下並無夾註，可見這是抄寫或排印的錯誤。

至於脫脫等〔宋史〕卷四四「理宗本紀」說：

開慶元年……八月……乙酉（十四日），降人來言：「大元皇帝崩於軍中。」【註二七】

則是指在八月十四日，降人來說這句話而已。並非是指蒙哥汗死在八月十四日。

另外，無名氏〔宋季三朝政要〕卷三說：

開慶元年……十一月……韃靼憲宗皇帝晏駕於釣魚城下。（賈）似道乘機遣使約和，陰許歲幣，兵解而去。【註二八】
則是由於敘述十一月賈似道求和的事，而因此先敘述背景。並非是指蒙哥汗死在十一月。

四、關於蒙哥汗死因的各種說法

（一）氣死的說法

宋人黃震〔古今紀要逸編〕說：「元主蒙哥爲王堅所挫辱，憤死。」又說：「蒙哥敗于合州，憤死軍中。」【註二九】

宋人鄭思肖〔鐵函心史〕卷下「大義略述」也說：

……韃主蒙哥犯蜀，迫雲頂山（按：實爲釣魚山），其山險峻，素爲王堅所據。韃遣人說其來。堅命衆軍立山頂，裸形望之穢罵。蒙哥竟飲氣病死。【註三〇】

蒙哥汗是氣死的說法，可能是出於傳聞之誤；目前也無人採信，因此不必詳細討論。

（二）戰死的說法

1. 淹死的說法

小阿美尼亞人海屯（Haithon）在一三〇七年口授的東方史〔海屯紀年〕中說，蒙哥汗在圍攻中國海中的島嶼時，潛水者在他的船底鑿了洞，他也就跟着船沉到海底而淹死。【註三一】

蒙哥汗並未圍攻過中國海中的島嶼。因此，這種說法不值得採信。

2. 中飛矢而死

中國的史書，最早提到傳說蒙哥汗是中飛矢而死的出現在明代。元末陳桱的「通鑑續編」並沒有談及蒙哥汗的死因。明憲宗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商輅著的「續資治通鑑綱目」，首先說：「蒙哥……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註三二】以後，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薛應旂著的「宋元通鑑」【註三三】，明穆宗隆慶五年（一五七一）王宗沐著的「續資治通鑑」【註三四】，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陳邦瞻著的「宋史紀事本末」【註三五】，清聖祖康熙卅八年（一六九九）邵遠平著的「元史類編」【註三六】，清末民初屠寄著的「蒙兀兒史記」【註三七】，也都採取同樣的說法。不過，這些史學家們都稟承着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基本原則。薛、王二氏的通鑑所說的同商輅一樣：「或傳其中飛矢。」「宋史紀事本末」則說：「或傳中飛矢死。」「元史類編」則說：「或云爲飛矢所中。」「蒙兀兒史記」則說：「或云爲流矢所中。」所謂「或傳」、「或云」，就是表示只是有這種傳說而已，並非十分可靠。

可是，這種史料到了並非鑽研歷史的文人手中，「或傳」、「或云」的字眼就不見了。像在商輅「續資治通鑑綱目」出版了四十一年之後，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合州所立的「新建王張二公祠堂記」石碑便說：

釣魚山……蒙哥駐兵城下，攻圍屢月不克，俄中飛矢死，圍解。【註三八】

於是，這樣就變成了肯定的意思。又由於這個石碑是至今猶存的「實物資料」【註三九】，因此，這個碑文便被現代若干學者用來作爲蒙哥汗是戰死的強力理由之一【註四〇】。其實，中國最早說這件事的「續資治通鑑綱目」，並沒有肯定蒙哥汗是「中飛矢」而死的。

此外，敘利亞人阿部耳法拉底（Gregory Abulfaradj）在一二六四年編的「世界史節本」中也說，蒙哥汗是中箭死的【註四一】。這種外國方面的記載，來源無法詳考，因此無法深論。

3. 劉克莊的「蜀捷」詩

宋人劉克莊的「蜀捷」詩說：

吠南初謂予堪侮，折北俄聞彼不支；撻覽果殲強弩下，男章有入檻車時。

鍾繇捷表前無古，班固銘詩繼者誰；白髮腐儒心膽薄，一春林下浪攢眉。【註四二】

〔釣魚城史實考察〕據此而說：

南宋劉克莊在「蜀捷」詩裡說：『撻覽果殲強弩下』，認為蒙哥是被宋軍打死的。【註四三】

我認為，劉克莊所謂的「撻覽果殲強弩下」，並不是指蒙哥汗被宋軍的強弩射死，理由如下：

(1) 如果劉克莊（一一八七——一二六九）知道蒙哥汗是被宋軍的強弩射死的話，那麼，當時南宋應該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但是，從當時其他宋朝人所作的文集中，却再也找不到說蒙哥汗是被宋軍強弩射死或射傷而死的說法。

(2) 在整部〔後村先生大全集〕中，劉克莊也有直接提到蒙哥汗死亡的事，可是都沒有說蒙哥汗是被強弩射死或射傷而死的。

例如，劉克莊在「知安慶府池州都統制蘇劉義爲昨在重慶全城却敵特授五官制」中說：

……具官某，頃提師干，往援井絡。金城全璧，數州脫鬼簿之危；氈帳隕星，萬里載帝範而去。【註四四】

如果，劉克莊認為蒙哥汗是被宋軍打死的；那麼，劉克莊可以使用更明白的指出宋軍將蒙哥汗打死的詞句，像「弩殲其主」之類的。

又如，劉克莊在「與賈（似道）丞相書」中說：

去春初聞移闔外蜀之報，……既而茸蘘泝峽矣！〔按：指賈似道受命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前往救援四川。〕

韃橋斷矣！合圍解矣！帝紀歸矣！蜀祲甫清，鄂警又至。公不忍閉關自保，身先羣帥，投袂疾趨。【註四五】

劉克莊在此書中，仍然沒有使用蒙哥汗被打死的詞句。

(3) 其實，劉克莊所謂的「撻覽果殲強弩下」，只是一句形容的話而已，意思是說：四川之役，宋朝獲得了一次類似以前宋遼澶淵之役——用強弩將敵方大將蕭撻覽打死——的偉大勝利。

宋眞宗景德元年（遼聖宗統和二十二年，一〇〇四），遼聖宗和蕭太后率領大軍南侵，長驅深入，直逼黃河北岸的澶州

（今河北漢陽）。宋眞宗採納宰相寇準的建議，御駕親征，前往澶州督師，宋軍士氣大振。結果，宋遼雙方達成和議。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澶淵之盟」。而在和議達成之前的澶州之戰中，宋軍使用牀子弩（弩砲）射中了遼國的大將——統軍使蕭撻覽——並非皇帝，使蕭撻覽身負重傷而死【註四六】。

其實，「後村先生大全集」也記載了劉克莊用同樣的形容詞句去歌頌當時宋朝宰相賈似道在鄂州方面的勝利。景定元年，劉克莊在「賀賈丞相啓」中說：

鹿磯凱奏，鵠閣哀歸……江淮晏清，緊誰力也……旣奠井絡，甫還渚宮……相且躬臨，士皆死戰；鄂雖全壁，虜欲攻瑕。耕內地爲度夏之謀，踐數州如無人之境……盡下裏、樊之甲，親當興（國）、壽（昌）之鋒；或執訊獲醜而來，或剖腹輿尸而去。成先太師經濟之初志，慰今天子夢卜之渴心。萊公殪撻覽於澶淵，力扶景德（按：寇準後來被封爲萊國公）；魏國走劉麟于淮右，光輔紹興。【註四七】

由此可見，劉克莊所謂的打死撻覽，只不過是一個形容的詞句而已。

4. 中砲風發病而死和中飛石而死

說蒙古汗是被砲風震傷因而發病致死的，目前所知，最早出現在明憲宗成化二十年（一四八四）謝士元作的「游釣魚山詩序」，其中說：

憲宗侵蜀，駐兵城下，守臣王堅悉力戰守，憲宗不能逞，卒以炮風致疾殂。【註四八】

明神宗萬曆（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間的田九垓（萬曆）合州志卷一，無名氏「釣魚城記」也說：

宋高宗南渡之後，北兵益熾。彭大雅奉命入蜀，命郡縣圖險保民。太尉甘閏至州（按：合州），觀此山（按：釣魚山）形勢，可以據守，故城之。郡牧王堅發郡所屬……五縣之民……以完其城。王堅去任之後，繼任乃安撫張珏也。……已未歲，值大旱。自春至秋，半年無雨。北兵圍逼其城，意城中無水，急攻之。一旦至西門外，築臺建橋樓，樓上接桅，欲觀城內之水有無。城內知其計，置砲於其所。次日，憲宗親率其兵於下。珏（按：實際上這時的釣魚城主將仍是王堅）命城中取魚二尾，重三十斤者，蒸麪餅百數。俟緣桅者至其竿木，方欲舉首，發砲擊之，果將上桅人遠擲

，身殞百步之外。即遺鮮活之魚及餅以贈，諭以書曰：「爾北兵可烹鮮食餅，再宗十年，亦不可得也。」時北兵遂退。憲宗爲砲風所震，因成疾。班師至愁軍山，病甚。……次過金劍山溫湯峽而崩。【註四九】

上述的兩篇文字，也成爲目前主張戰死說的學者的強力理由。

到了清代，又出現了蒙哥汗直接中了飛石因而發病死亡的說法。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所立的「釣魚城功德祠」碑文說：

元憲宗侵蜀，駐兵（釣魚）城下……憲宗爲飛石所中，致疾而殂。【註五〇】

即使是主張戰死說的學者，對於那麼多不同方式的戰死原因——溺死、中飛矢、中強弩、中砲風、中飛石，也難以取捨。因此，早期主張戰死說的學者，雖然都贊同蒙哥汗是負傷而死的，可是也沒有詳細考證是那一種方式致死的。直到去年，陳世松先生才在「宋元戰爭史」中提出蒙哥汗是被砲風震傷因而發病死亡的理由。他說：

無言氏「釣魚城記」所載蒙哥「過金劍山溫湯峽而崩」，詳細具體，且符合歷史地理情況，較爲可信。蒙哥既能由釣魚城東南角紮營之地，轉移至溫湯峽，起碼說明他並非是在釣魚城戰役中直接斃命的。而「爲砲風所震，因成疾」，記載此事的萬曆「合州志」的作者，僅稱蒙哥「爲炮風所震」，或稱「元主驚悸而死」，都未包含中箭、中飛石的成份在內；因此，也顯得較爲客觀公允。【註五一】

其實，「釣魚城記」一文，不符事實以及疏漏之處很多。例如：(1)它沒有提到建設釣魚山城時最重要的人物——余玠和冉氏兄弟。(2)在蒙哥汗攻打釣魚城時，它把宋軍的主將說成是張珪。(3)它說當年「值大旱，自春至秋，半年無雨。」其實，「元史」「本紀」所記載的釣魚城之戰，四月和六月都有下雨，而四月的一場「大雷雨」，更是長達「二十日」。【註五二】因此，如果以「釣魚城記」說蒙哥汗中了砲風發病死亡，來作爲蒙哥汗是負傷而死的證據，理由則仍嫌不足。

關於蒙哥汗中砲風的說法，很可能是從當時蒙古大將汪德臣中了砲風發病死亡的事件而演變出來的。什麼叫做砲風？古代的大砲，即拋石機，砲彈通常是塊石頭。當石彈被拋射出去之後，直接被擊中的人會死亡或負傷；此外，石彈在空中急速飛行時，帶動了週圍的空氣，這就是砲風。距離飛行的石彈很近的人，也可能會被砲風震傷。在釣魚城之戰中，蒙軍的鞏昌

等路都總帥汪德臣便是中了砲風因而發病死亡的。〔元史〕卷一五五「汪世顯傳」附「汪德臣傳」說：

攻釣魚山，守臣王堅負險，五月不下。（汪）德臣單騎至城下，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爲飛石所中。遂感疾……卒不起。

張維「隴右金石錄」，「元」，王〇「汪德臣神道碑」也說：

攻圍凡五閱月不下。公（汪德臣）……單騎逼城下。名呼堅曰：「我來欲活汝一城軍民耳！」語未既，幾爲飛石所中。公遂感疾。上遣使問勞……以緡雲山寺（今重慶北溫泉）高爽，命往居之……俄以疾薨。實己未（開慶元年）六月二十一日也。〔註五三〕

從上述兩段記載的文字看來，汪德臣是中了砲風因而發病死亡的。而蒙哥汗中砲風的說法，便可能是從汪德臣中砲風的事件演變而來。至於蒙哥汗直接中飛石的說法，則又可能是從蒙哥汗中砲風的說法演變而來的〔註五四〕。

5. 在七月的攻城戰中負傷而死的說法

主張戰死說的學者，大都又認爲，蒙哥汗是在七月的一場攻城戰中負傷而死的〔註五五〕。

其實，在「元史」、「宋史」以及宋元時期的史料中，見不到蒙軍在七月有攻擊釣魚城的紀錄。而本文第三節，已經考證過黑石峽之戰的時間，是在七月九日之後，七月廿一日之前。又從本文第二節可知，在七月上旬，蒙軍首先由於感染疾病的情形更加嚴重，而起了班師的議論；接着又由於呂文德的援軍逐漸逼近，使得蒙軍的主力必須準備調往嘉陵江方面作戰。因此，不太可能還會有由蒙哥汗親自指揮的強攻山城行動。七月九日以後的黑石峽之戰期間，釣魚山下只有蒙軍三千人，而且蒙哥汗本人也不在釣魚山下。而黑石峽之戰，雖然呂文德的舟師被擊敗，但是呂文德的實力並未全部喪失——從九月呂文德又率領舟師從四川返回江湖救援鄂州可以看出。因此，黑石峽戰後，蒙軍必然還會留下部份的兵力在嘉陵江方面，以防止宋朝援軍的再度北上。所以，這時，雖然蒙軍主力中的大部或一部會返回釣魚山下；但是經過黑石峽這個大戰之後，必然需要休息整補。因此，也不可能有由蒙哥汗親自指揮的強攻山城的行動。

因此，說蒙哥汗在七月攻打釣魚城，既無史料的依據，也不合乎情理。

但是，從明代以來的若干史書，却有蒙軍在七月強攻釣魚城的記載。則是源自商輅「續資治通鑑綱目」。

「元史」卷三「憲宗本紀」九年條說：

六月丁巳（按：六月無丁巳日），汪田哥（按：汪德臣又名田哥）復選兵夜登外城馬軍寨，殺寨主及守城者。王堅率兵來戰。遲明，遇雨，梯折，後軍不克進而止。

商輅「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廿一，開慶元年七月條，大綱說：「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州城下，餘衆解圍北還。」然後，緊接着的小注則說：

王堅固守……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

此書將「元史」「汪德臣附傳」所載汪德臣單騎至城下招降的事（見本節4），混雜在「元史」「本紀」所載六月強攻山城之戰鬥中間。其實，「元史」以及「汪德臣神道碑」（見本節4），並沒有說它們是一回事，而且兩件事都是發生在六月。但是，由於「續資治通鑑綱目」有那樣的注文。於是，以後的若干史書，也就都相沿它的說法，像明代薛應旂「宋元通鑑」【註五六】、天宗沐「續資治通鑑」【註五七】、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註五八】，都將商輅書中上述的那段小注，幾乎完全相同的放在開慶元年七月條下，並且變成了正文。直到清代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註五九】以及畢沅「續資治通鑑」【註六〇】，仍然將前述各書的那段文字，大同小異的引用來作正文。不過，徐、畢二氏已經修正了前述各書的一個錯誤，即不再放在七月條下，而改放在六月條下。總之，蒙軍在七月並沒有強攻釣魚城。

（三）病死的說法

「元史」卷三「憲宗本紀」九年條說：

六月……帝不豫。七月……癸亥（廿一日），帝崩于釣魚山。

從「宋史」以來的正史的「本紀」，記載皇帝病死的方式，通常就是這樣。先在某日「說帝不豫」，然後再在某日說「帝崩」。

」。所以，照「憲宗本紀」字面的解釋，就正如姚從吾先生所說的：「『帝不豫』，即是有病了」；「到了癸亥，蒙哥汗即在釣魚山下附近宮帳中因病重而死了」【註六二】。

波斯人拉施特（一二四七——一三一八）主編的「史集」說：

當蒙哥合罕正在圍攻上述城堡（按：釣魚城）時，隨着夏天的到來和炎熱的加劇，由于那個地區的氣候（惡劣），他得起赤痢來了，在蒙古軍中也出現了霍亂，他們中間死了很多人。世界的君主用酒來對付霍亂，並堅持飲酒。但突然，（他的）健康狀況惡化，病已到了危急之時，于是……他在那座不祥的城堡下去世了。【註六二】

同書又說：

蒙哥合罕正在圍攻釣魚山堡，由於瘴癘之氣，霍亂蔓延開來，蒙哥合罕染病去世。【註六三】

中國的史料，也有很多關於當時蒙軍感染疾病的記載。「元史」卷一二九「紐璘傳」說：

戊午（寶祐六年）……紐璘至涪，造浮橋……聞大軍（按：蒙哥汗的主力）多瘡癘，遣人進牛犬豕各萬頭。明年（開慶元年）……宋將……攻涪浮橋……（蒙軍）士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

「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澤傳」也說：「夏……軍中大疫」。王磐「史天澤神道碑」則說：「夏秋之交，軍中多疾疫」。「史天澤家傳」則說：「秋，疫作」。（詳見本文三所引文。）

「元史」卷一三五「月舉連赤海牙傳」說：

月舉連赤海牙……從憲宗征釣魚山，奉命修藥以療師疫。

從上述可知，從寶祐六年尾開始，蒙軍由於水土不服，已經有很多人患了流行性的傳染病。到了開慶元年夏季，流行性傳染病更加蔓延，許多人因此病死。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七月，而且更加嚴重，以致引起了班師的議論。而蒙哥汗本人也在六月感染了疾病，到了七月廿一日，終於病重而死。

清文宗嘉慶六年（一八五六），畢沅「續資治通鑑」也說，蒙哥汗「自因頓兵日久，得疾而死。」【註六四】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元史新編」也說，蒙哥汗「因暑雨，病殞西蜀。」【註六五】畢、魏二氏都採取病死的說法。我也贊同

病死的說法。

五、從蒙哥汗死後的歷史發展去探究他的死因

經過以上的分析，可知主張戰死說的學者所依據的史料，其實並不十分可靠，而所持的理由也不够足份。我認為，蒙哥汗應該是在病死的。

但是，由於上述所有的史料，其中沒有任何一部書是絕對毫無錯誤的權威之作；因此，如果僅僅是從記載蒙哥汗死因的史料上直接去考訂真偽，那麼這個問題將仍然是一個見仁見智、無法定論、永無休止的爭議。所以，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另闢途徑，即從蒙哥汗死後的歷史演變過程去探討。

蒙哥汗死後的第二年，宋理宗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統元年，一二六〇）三月廿四日，忽必烈在開平府（今察哈爾多倫縣）就任蒙古皇帝，即元世祖。四月十日，忽必烈汗即派遣郝經為國信使，出使宋國〔註六〕，告示宋朝他登基的消息，並要求同宋朝繼續商談上次在鄂州尚未完成的和議。同時，為了達成和議，忽必烈汗又下令邊區的將領，不許攻掠宋朝。〔元史〕卷一五七「郝經傳」說：

世祖即位，以（郝）經為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敕沿邊諸將毋鈔掠。郝經並且攜帶了一封忽必烈汗致宋理宗的國書。這封國書說：

皇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致書于南宋皇帝：爰自平金之後，蜀漢荆揚，挈兵幾三十年，交聘非一，卒無成約。比者川蜀擣虛，荆湖批亢（按：指蒙哥汗大舉南侵之役）；生靈有塗炭之苦，戰士有暴露之勞。朕甚憫焉。是以即位之始，首議寢兵，用示同仁，以彰兼愛；期於休息元元焉，天下共響有生之樂而已。

且南交廣而西巴蜀，北長江而東滄海，分兵守險，彼所恃以爲國者也。今戰艦萬艘，既渡江以扼海；鐵騎千羣，復踰廣而出蜀。四塞無結草之禦，六軍有破竹之威。人所共知，不必偏舉。於此時也，非不能犄角長駟，水陸並進。秋風

虎旅，指揮看浙江之潮；春露鱸膾，談笑挹吳山之翠。蓋以佳兵不祥，素所不喜；守位以仁，今之本心。又況靖康南北釁端，初無盤錯大故，非如女直（按：眞）、西夏惡積仇深而不可解者也。

往者彼已勝負之事，往來曲直之辭，各有攸當，置而勿論。自今作始，咸取一新。故先之以信使，申之以忱辭；告寶位之初登，明朕心之已定。准親王上宰，能報聘之一來；則保國樂天，必仁智之兩得。苟盡事大之禮，自有歲寒之盟。

若乃憂大位之難繼，慮詭道之多方；坐令失圖，自甘絕奔。則請修浚城池，增益戈甲，以待秣馬利兵，會當大舉。論天時則炎瘴一無畏懼，論地險則江海皆所習知。必也窮兵極討，一決存亡而後已。力之所至，天其識之。禍自彼挑，此無可憐。在我者至誠可保，在彼者聽所擇焉。毋循前例，止作虛文，時薦清和，善綏福履。不宣白。庚申年（按：中統元年）四月七日，開平府行。【註六七】

假使，蒙哥汗是被宋軍打死或打傷致死的。那麼，宋朝對忽必烈汗而言，已經是一個具有殺死胞兄、殺死先帝的血海深仇的大敵；而宋朝對蒙古帝國而言，也已經成爲殺死蒙古皇帝而加諸蒙古帝國奇恥大辱的世仇。忽必烈汗在即位之後，馬上忘却這種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主動的去尋求同宋朝的和平——儘管對宋朝而言是個割地納幣的不平等的和平，於情於理都說不通，就國家的體統而言更說不通。而在國書中，忽必烈汗更明白的表示了，宋蒙兩國的「南北釁端，初無盤錯大故」，並非像宋朝同女眞、西夏的「惡積仇深而不可解」的。又表示，「往者彼已勝負之事」，都可以「置而勿論」。由此可見，蒙哥汗絕不是被宋軍打死或打傷致死的。

當時，蒙古駐守益都（今山東益都）的江淮大都督李壇，由於想反抗蒙古，因此一直想挑起宋、蒙兩國的戰事。他是在是年八月，向蒙廷虛報說，宋軍集給了七萬五千人，要來攻打漣水（今江蘇漣水）。而蒙廷却回覆李壇說：「朝廷方通和議，邊將惟當固封圉。且南人用間，其詐非一，彼既不至，毋得妄動。」【註六八】

當時，南宋的宰相賈似道由於害怕郝經入朝後會洩露了他在鄂州秘密求和的消息；因此，他命令淮東制置司將郝經等一行扣留在眞州（今江蘇儀眞）【註六九】。而在景定元年、二年中，宋軍也使用小部隊北上攻擊蒙古的邊區。景定二年五月五

日，蒙古朝廷草擬了一份「大蒙古國行中書省移宋三省」的牒文，準備送往宋廷。牒文說：

皇帝卽位之初，重惜南北生靈之故，一視同仁，首主和議，特遣信使敬奉國書，講信修睦。往年征進大軍，卽令分還本屯。仍嚴勅邊將，非奉上命，毋得妄動。

爰自行人銜命已來，載更歲律，寂無來音。其於講修之事將如何哉？不惟有失忱辭，反啓邊釁。以至攻圍我上右，侵軼我鄧鄙，襲華陽，擾隨州，刼掠真陽，數犯漣水。皆出於使輶已入彼境之後。夫信與義，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一旦捐棄，曲直所在，自有任其責者矣！若和議可必，卽當速遣重使與我行人偕來。其或逗遛歲月，別有異議；請選師徒，具戈甲，預致師期，相與會獵於江南之地可也。於斯二者，惟所擇焉。

比來闔將屢請出師，以報侵疆之役。省府謹守聖訓，弗允所請。不識日者數舉，果何爲而然耶？今大駕北狩，已是南還。陛見之日，何以爲奏？冀早示定議，毋坐失良圖，以貽後悔。

同月八日，蒙廷又將上述的牒文改作河南經略司致宋淮東制置司的牒文發出，並派遣崔明道爲使臣，攜帶這封牒文前往宋朝【註七〇】。

如果，蒙哥汗真是被宋軍打死或打傷致死的。那麼，忽必烈汗和蒙古朝廷絕不會在使臣毫無回音以及宋軍不斷地北上攻擊蒙古領土時，還仍然希望尋求同宋朝的和平，並且在國書中表示出頗大的誠意。

郝經等人一直被宋朝囚禁在眞州。郝經曾經一再的致書給宋朝的兩淮制置使、宰相、皇帝，但都沒有回音。景定二年，郝經在「上宋主請區處書」中說：

夫貴朝之與本朝，初無大故。【註七一】

以後，郝經又在「與宋國丞相書」中說：

本朝與貴朝，初無大故。無故而交兵者，幾三十年，未知孰主張是而使至此極也。……主上踐阼，下止兵之詔，發輸平之使。【註七二】

郝經又在「上宋主陳情歸國萬言書」中說：

本朝……（與貴朝），無金源氏之世讐。【註七三】

郝經在這些書信中，一再的表示了，宋蒙兩國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這說明了當初忽必烈汗派遣郝經前往宋朝議和時的一個背景：即兩國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至少在蒙古方面的感覺是如此。如果，蒙哥汗是被宋軍打死或打傷致死的，郝經絕不可能還會在這些書信中表示兩國並無深仇大恨。

直到宋朝對蒙古的議和提議仍然不理不採。忽必烈汗才下令蒙軍恢復對宋朝的攻掠（並非全面南侵）。是年七月，忽必烈汗下詔訓示蒙軍將士說：

朕即位之後，深以戰兵爲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爲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當整爾士卒，礪爾戈矛，矯爾弓矢，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爲問罪之舉。尙賴宗廟社稷之靈，其克有勳。卿等當宣布朕心，明諭將士，各當自勉，毋替朕命。【註七四】

從這篇詔書中，可以看出忽必烈汗起初對和議是抱着很大的誠意；而這時，忽必烈汗也只是以宋朝北上攻擊，拘留使臣，拒絕和議，作爲出兵問罪的藉口。如果，蒙哥汗是被宋軍打死或打傷致死的，那麼，這是一個最好的問罪的藉口。又從這篇詔書中，可知在是年春天，蒙古大臣都已經請求「舉兵南伐」。如果，蒙哥汗是戰死的，蒙古大臣便用這個理由來請求出兵復仇，忽必烈汗還能用「兩國生靈」、「猶待信使還歸」的藉口拖延半年嗎？此外，這時，蒙古雖然不是大舉南侵，只是恢復以前那種秋進春退式的攻掠；但是，兩國已經正式回到交戰狀態。如果，蒙哥汗是被打死或打傷致死的；那麼，忽必烈汗也大可以用替蒙哥汗復仇爲名，來提振士氣。

宋度宗咸淳九年（元世祖至元十年，一二七三）二月，襄樊戰役結束，元軍佔領襄陽。次年（咸淳十年），元朝決定大舉南侵。六月十五日，元世祖下令向宋朝興師問罪，並下詔訓示行中書省（南征軍統帥部）以及元軍將士說：

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

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

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註七五】

如果，蒙哥汗是被宋軍打死或打傷致死的，那麼，這時，元朝已經決定全面南侵，向宋朝興師問罪，大可以將蒙哥汗被宋軍打死或打傷致死的事也列爲南侵的藉口之一，以及以復仇爲名來提振士氣。

是年九月，元朝開始大舉南侵。兩年後——宋恭帝德祐二年（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正月十八日，宋恭帝在臨安向元軍投降。二月七日，元朝南征統帥伯顏上賀表給元世祖。賀表中說：

恭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域；際丹崖而述職，奄瀚海而爲家。獨此島夷，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踰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爲城下之盟。逮凱奏之言旋，輒詐謀之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招納我叛臣，盜漣海三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樊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卽出於自求，怒致聞于斯赫。【註七六】

在這篇賀表中，顯示了元朝僅以宋朝扣留蒙古使臣以及接納蒙古叛將李璫的投降，作爲出兵襄樊的藉口。如果，蒙哥汗是被宋軍打死或打傷致死的；那麼，伯顏在賀表中也應該將這個事件列上，作爲元軍攻打襄樊的藉口。而且，這時宋朝已經投降，如果蒙哥汗是被宋軍打死或打傷致死的；那麼，賀表中也應該加上大仇已報之類的辭句，可是全部的表文中却沒有這類的辭句。

當時，東昌路（今山東聊城）所上的「賀平宋表」（徐世隆作）也說：

聖人之兵仁而威，無遠不服；天下之勢離必合，有險卽平。方期四海之會同，豈許一江之限隔。捷書屢至，慶頌交馳。欽惟皇帝陛下，至德體元，中華開統；美化既東西之被，兼愛豈南北之分。初建文臣，播告方國；昭示包荒之量，絕無陵弱之心。弗圖島夷，輒拘使節。誘納我叛將，盜據我歷城（濟南）；雖就鯨鯢之誅，尙遺蜂蠆之毒。蠹爾三苗

之弗率，命予羣后之徂征；一鼓而定荆襄，再駕而降鄂岳。斬黃面縛，江漢心歸；鐵瓮之堅城已摧，金陵之王氣何在？楚地六千里，不勞秦將之增兵；錢塘十萬家，坐見吳王之納土。僞將悉朝於闕下，幼君退竄於海中；方知恃險而亡，應悔求知之晚。茲雖天意，實出聖籌。歷觀往古混一之難，未有今日飛渡之易。臣某等，叨居牧寄，喜聽凱音；矧曾充載筆之臣，尤當述集勳之事。駿奔效命，正海內一家之時；虎拜揚休，上天子萬年之壽。【註七七】

這篇表文中所述的伐宋理由，同伯顏的賀表一樣，而且同樣的也沒有大仇已報之類的賀詞。

同年閏三月廿四日，宋恭帝等一行抵達大都。五月二日，元世祖在上都舉行受降典禮，正式接受宋恭帝的投降。然後，元世祖又降封宋恭帝爲瀛國公【註七八】；又在上都近郊，以平定宋朝，而派遣官員告祭天地、祖宗【註七九】。

元朝的「江南平告天地文」（王磐作）說：

伏以時逢喪亂，岳瀆分疆，運屬休明，乾坤一統。瞻靖康之餘孽，據江表以偷生；依阻山谿，動搖戈甲。不修歲幣，久虧事大之儀；留止行人，永絕親隣之好。旣興師而問罪，卽列陣而長驅；戈舡浮鄂渚之波，鐵馬渡松關之險。方知力屈，始悔前非；遂奉表以求哀，願納地而入覲。宋主某已於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是皆上帝垂祐，靈祇降祥；欲康功普被於黔黎，故盛事施及於冲眇。尚祈昭監，永錫休嘉。【註八〇】

這篇告祝文也只是以宋朝不奉獻歲幣和扣留使臣作爲南侵的藉口，也沒有大仇已報之類的詞句。

元朝的「江南平告太廟祝文」（王磐作）說：

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勳。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船飛渡，列戍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表，願納地以歸朝。宋主某已於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書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願冲眇以何功？實祖宗之餘蔭。尚祈昭監，永錫休嘉。【註八一】

這篇告祝文仍然沒有以蒙哥汗被宋軍打死作爲南伐的藉口，也沒有大仇已報之類的詞句。

元朝的「降封宋主爲瀛國公制」（王磐作）說：

時逢屯否，嶽瀆分疆，運值休明，乾坤一統。眷靖康之餘裔，擅吳會之奧區；遠隔華夏，久睽鄰好。我國家誕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風朔雪之鄉，盡修職貢；若木虞淵之地，靡不來庭。歷六合而混同，豈一方之獨異；用慰僊蘇之望，爰與問罪之師。戈船飛渡，而天塹無憑；鐵馬長驅，而松關失險。宋主熈乃能察人心之向背，識天道之推移；正大姦誤國之誅，斥羣小浮海之議。決謀宮禁，送款軍門；奉章奏以祈哀，率親族而入覲。是用昭示大信，度越彝章。位諸臺輔之尊，爵以上公之貴，可封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註八二】

這篇制文，仍然沒有以蒙哥汗被宋軍打死作為南侵的藉口，也沒有大仇已報之類的詞句。

假使，蒙哥汗是被宋軍打死或打傷致死的，那麼，元朝在滅亡宋朝之後，必定會作某種程度的報復。但是，從史料上找不到宋朝滅亡以後，元朝曾經作過任何的報復，以洗雪蒙哥汗被宋軍打死或打傷致死的奇恥大辱。即使是蒙哥汗死亡的地點——合州釣魚城，在四川其他的宋朝據點全部都陷落之後才投降，也沒有遭受屠城的報復。

宋端宗景炎三年（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二月，重慶、夔州等地陷落，四川的宋朝據點，只剩下一座合州釣魚城，其餘的則已全部淪陷【註八三】。釣魚城守將王立感到孤掌難鳴，並且早已同圍攻釣魚城的元朝東川行樞密院（行院）結下深怨【註八四】。而東川行院的主帥合刺、闊里吉思二人【註八五】，原是蒙哥汗的親信，以蒙哥汗在釣魚城下死亡，所以一直想攻下釣魚城來洩憤【註八六】。因此，王立便派人向元朝的四川行院副使李德輝約降。東川行院非常不滿，企圖阻止李德輝前來受降，而向李德輝說：

前歲公爲書招珏（按：張珏，王立之前的釣魚城守將），誠亦至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今立，鉅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公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

李德輝則答覆東川行樞密院說：

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爲哉。【註八七】

如果，蒙哥汗是被宋軍打死或打傷致死的；那麼，東川行院要阻止李德輝前來受降的理由，就不必只是「未必定降」和「抗蹕先朝」了。他們可以用將蒙哥汗打死或打傷致死之類的话，那麼，李德輝也就沒有理由前來受降了。

是年三月，王立終於向李德輝獻城投降【註八八】。東川行院見李德輝獨自受降，深以無功爲恥，便一面向朝廷奏報說李德輝越境生事，一面將王立關了起來【註八九】；又奏報說王立「久抗王師，嘗指斥憲宗，宜殺之。」元朝的樞密院便照東川行院所說的向元世祖報告。而這時的降臣李諒，也說王立以前殺害了他的妻子。於是，元世祖便下令要將王立處死【註九〇】。不久，元世祖見到了西川行院副使、兼安西王相李德輝方面的報告，瞭解了王立投降的前後經過。於是，元世祖便下令召王立入京，免除了他的死罪，並且任命他作潼川路安撫使、知合州【註九一】。

如果，蒙哥汗是戰死的；那麼，東川行院要告王立的罪狀，就不必僅僅是「嘗指斥憲宗」便罷休。他們可以用更嚴重的罪名，像是指揮宋軍將蒙哥汗打死或打傷致死之類的罪名。冠上了這種罪名，王立必死無疑，而釣魚城也一定難以逃過屠城的劫數。

無名氏「釣魚城記」還說，蒙哥汗曾經有遺詔，要屠釣魚城。記文說：

憲宗爲砲風所震，因成疾。班師至愁軍山。病甚。遺詔曰：「我之嬰疾，爲此城也。不諱之後，若克此城，當赭城剖赤而盡誅之。」次過金劍山溫湯峽而崩。……戊寅（景炎三年）春……（李德輝）乘舟至（釣魚）城下……汪總帥蒙古軍，曰：「我等攻守此城十餘年，戰而死者以萬計，憲宗皇帝亦因此城致疾而崩，臨崩，遺詔：來降，必因攻困致斃，赭城。則當上爲先帝雪恥，下爲亡卒報讎。」李相諭慰未決。又數日，朝使適至。奉詔旨：魚城既降，可赦其罪，諸軍毋得擅便殺掠，宜與秋毫無犯。【註九二】

李則芬先生認爲憲宗遺命屠城之說不可信。他說：「憲宗臨終遺命屠合州之說，也是宋人傳會之詞，於理必無此事。蒙古軍法，抵抗者死，要屠合州，自有法典具在，無須皇帝遺命。」而在李德輝前往釣魚城招降時，東川諸將都以王立未必真會投降的理由來反對。李先生又說：「若憲宗果有屠城遺命，則諸將振振有詞，何故不舉此大理由來反對德輝招降？」【註

張森楷《合川縣志》也說：

……且果有屠城之遺命，德輝敢受王立降乎？受降而不屠城，將置遺命於何地乎？【註九四】

我贊同李、張兩位先生的說法，蒙哥汗遺命屠城的事，是不值得相信的。

主張戰死說的學者又認為，「元史」說蒙哥汗病死，是根據元朝《實錄》而來的，而元朝《實錄》則將蒙哥汗被宋軍打死這件不光彩的事加以掩飾了【註九五】。我却認為，最後元朝已經滅亡了宋朝，假使，蒙哥汗是被宋軍打死的，那一切的血海深仇、奇耻大辱都因滅亡了宋朝而洗雪了，報復了。這時，宣告大仇已報的意義一定是大過掩飾這件不光彩的事的意義。

經過以上的分析，我認為，蒙哥汗並不是被宋軍打死或打傷致死的，而是病死的——這樣才不會導致蒙古（元朝）對宋朝有不可化解的深仇大恨。

六、結 論

經過以上的分析，我認為主張戰死說的學者所依據的史料，其實並不十分可靠，而所持的理由也不够充份。

此外，一個漢人，都會具有一種潛在的漢民族意識，對於歷史事件，尤其是在漢民族遭受到強大侵略者的時候，都希望漢民族能打死侵略者的大將，打死皇帝更好。像我讀歷史，讀到南宋初期韓世忠在鎮江龍王廟伏擊金兀朮未成，被金兀朮逃脫，就不禁大嘆可惜。而讀到明末袁崇煥在寧遠之戰中將努爾哈赤打傷致死的一說，便潛意識很高興的去相信。這種民族感情，有時就會使我們對於某些歷史事件，作成錯誤的判斷。

但是，如果僅僅是從記載蒙哥汗死因的史料上直接去考訂真偽，那麼這個問題將仍然是一個見仁見智、無法定論、永不止的爭議。

因此，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另闢途徑，即從蒙哥汗死後的歷史演變過程上去探討。元世祖即位之後，便派遣郝經前往宋朝議和，並在國書中明白的表示：宋蒙兩國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以前的一切都可以置而不論。以後，在元世祖下令

出兵攻宋的詔書中，都沒有以蒙哥汗被宋軍打死或打傷致死作為南侵的藉口，也沒有以替蒙哥汗復仇為名來提振士氣。臨安投降以後，在元朝大臣祝賀平宋的表文中，在元朝告祭天地、祖宗的祝文中，以及在元朝降封宋主的制書中，仍然沒有以蒙哥汗被宋軍打死或打傷致死作為南侵的藉口，也沒有大仇已報之類的詞句。而釣魚城投降之後，也沒有遭受屠城的報復。因此，可以證明蒙哥汗並不是被宋軍打死或打傷致死的，也不是氣死的，而是病死的。

註釋

【註一】：例如，姚從吾「元憲宗（蒙哥汗）的大舉征蜀與他在合州釣魚的戰死」（載「文史哲學報」，十四期，頁六一——八五，民國五十四年，台北）。標題雖稱「戰死」，內容却是說病死，姚先生所謂的「戰死」，是指在戰役中死亡，並非如一般採戰死說的學者所指的被打死或打傷致死。又，李則芬「元史新講」（中華書局，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台北），第二冊，第十一章，頁三三二——三三四。

【註二】：例如，黎傑「元史」（大新書局，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台北），第一篇第一章第一節，頁五〇。程光裕主編「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大學，民國七一年九月，修訂四版，台北），第十六章第五節，頁二七四。

【註三】：國立編譯館「高中歷史」（國立編譯館，民國七十六年一月再版，台北），第二冊，第十五章第一節，頁七九。

【註四】：例如，胡昭曦「反映南宋末年四川軍民抗元鬥爭的幾件歷史文物」（載「四川大學學報」，一九八一年第四期，頁九五——一〇二，成都）。陳世松等「宋元戰爭史」（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成都），第四章第六節，頁一五一——一五五。

【註五】：例如，蔡美彪等「中國通史」（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四月，北京），第五冊，第四編第二章第九節（二），頁四二六。

【註六】：西南師範學院歷史系「釣魚城史實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成都），六，頁六一。

【註七】：胡昭曦「宋末四川戰爭史料選編」（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成都），鄧廣銘「序言」，頁二。

【註八】：拙著「宋元戰史」，全四冊，食貨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三月，台北。

【註九】：詳見拙著「宋元戰史」，第二冊，第三章第十節，頁七三——七九七。

【註一〇】：蘇天爵「國朝名臣事略」，元元統刊本，學生書局影印，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台北。又，所引「家傳」，即王惲的「史天澤家傳」。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台北），卷四八，「史天澤家傳」，所載此事，與前書略同，但其中缺了「注射，親總舟師順」七字。

【註一一】：宋濂等「元史」，新校本，鼎文書局，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台北。

- 【註二】：蘇天爵「元文類」，「國學基本叢書本」本，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台北。
- 【註三】：陳樞「通鑑續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台北。
- 【註四】：商輅「續資治通鑑綱目」，「明成化十二年內府刊本，故宮博物院藏，台北」，卷廿一。
- 【註五】：薛應旂「宋元通鑑」，「明天啓六年長洲陳仁錫刊本，故宮博物院藏，台北」，卷一七。
- 【註六】：王宗沐「續資治通鑑」，「明隆慶五年山東重刊本，故宮博物院藏，台北」，卷四八。
- 【註七】：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台北」，卷一四五。
- 【註八】：畢沅「續資治通鑑」，「新校本，世界書局，民國五十年十月，台北」，卷一七五。
- 【註九】：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新校本，鼎文書局，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台北」，卷一〇二。
- 【註一〇】：「元史」，卷一五七，「郝經傳」。「元文類」，卷十二，郝經「班師議」。
- 【註一一】：余大鈞、周建奇譯，拉施特著「史集」，「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五年，北京」，第二卷，頁二七一——二七二，及頁二八九。
- 【註一二】：韓儒林「元代的吉利思及其鄰近諸部」，「載『中國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北京」。此文筆者未見，轉引自陳世松「蒙古定蜀史稿」，「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成都」，第五章第四節，頁七七，及註一。
- 【註一三】：「元史新講」，第二冊，第八章第一節，頁一一二。
- 【註一四】：同註廿一，頁二七一——二七二。
- 【註一五】：同註廿一，頁二八九。
- 【註一六】：屠寄「蒙兀兒史記」，「世界書局，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台北」，卷六，「蒙格可汗本紀」，九年七月條。
- 【註一七】：脫脫等「宋史」，新校本，鼎文書局，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台北。
- 【註一八】：無名氏「宋季三朝政要」，「筆記小說大觀二十八篇」本，新興書局，民國六十八年七月，台北。
- 【註一九】：黃震「古今紀要逸編」，「筆記小說大觀二十三編」本，新興書局，民國六十七年十月，台北。
- 【註二〇】：鄭思肖「鐵函心史」，世界書局，民國五十四年四月，台北。
- 【註二一】：引自Howorth, H. 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art I, p. 214. (London, 1876—1927, 4 Vols.) 又參閱「釣魚城史實考察」，六，頁五七。
- 【註二二】：同註十四。
- 【註二三】：同註十五。

【註三四】：同註十六。

【註三五】：同註十九。

【註三六】：邵遠平「元史類編」（廣文書局，民國五十七年五月，台北），卷一，「世紀」四，「憲宗」。

【註三七】：同註廿六。

【註三八】：張森楷等「合川縣志」（景印民國九年刊本，學生書局，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台北），卷卅六。

【註三九】：「釣魚城史實考察」，六，頁五九，及註四。

【註四〇】：同註卅九，六，頁五六——六一。

【註四一】：同註卅一。

【註四二】：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台北），卷廿三。

【註四三】：同註卅九，頁五六。

【註四四】：「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六八。

【註四五】：「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二。

【註四六】：「宋史紀事本末」，卷廿一，「契丹盟好」。李則芬「中外戰爭全史」（黎明文化公司，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台北），第三冊，第九篇第四章第三節，頁五八七——五九一。三軍大學「中國歷代戰爭史」（三軍大學，民國六一年五月，台北），第十冊，第十四卷第四章第三節，十，頁五七五——五八一。

【註四七】：「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〇。

【註四八】：張森楷「合川縣志」（民國刊本），卷七六，「序跋」下。轉引自「宋末四川戰爭史料選編」，頁五〇六。又，張森楷等「合川縣志」（景印民國九年刊本，學生書局，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台北，全七三卷），並無此文。

【註四九】：田九垓「（萬曆）合州志」，卷一。見「宋末四川戰爭史料選編」，頁四七四——四七六。又，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鼎文書局，民國六五年，台北），卷六一，「方輿彙編」，「職方典」，「重慶府部」，亦載此文。

【註五〇】：「宋末四川戰爭史料選編」，「乾隆四十四年『釣魚城功德祠』碑」，頁六三七——六三九。

【註五一】：「宋元戰爭史」，第四章第六節，頁一五三——一五四。又，所謂「元主驚悸而死」，語出「（萬曆）合州志」，卷三，「王堅」條。說：「王堅……知合州……蒙古親率師來攻……堅立戰敗之，殺其前鋒將汪德臣，元主驚悸而死。」（轉引自「宋末四川戰爭史料選編」，頁四七七。）

- 【註五二】：「元史」，卷三，「憲宗本紀」，九年條。
- 【註五三】：張維「隴右金石錄」，「石刻史料叢書甲編」本，藝文印書館，民國五十七年一月，台北。
- 【註五四】：又，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一七五，開慶元年七月條，「考異」則說：「〔重慶志〕謂其中飛石，蓋因汪德臣而誤也。」
- 【註五五】：例如，見同註四及註五的著述。
- 【註五六】：同註十五。
- 【註五七】：同註十六。
- 【註五八】：同註十九。
- 【註五九】：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台北〕，卷一四五。
- 【註六〇】：同註十八。
- 【註六一】：姚從吾「元憲宗（蒙哥汗）的大舉征蜀與他在合州釣魚城的戰死」。
- 【註六二】：余大鈞、周建奇譯，拉施特著「史集」，第二卷，頁二七〇。
- 【註六三】：同註六二，頁二八九。
- 【註六四】：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一七五，開慶元年七月條，「考異」。
- 【註六五】：魏源「元史新編」〔影印清光緒三十一年邵陽魏氏慎微堂刊本，文海出版社，民國七三年，台北〕，卷四。
- 【註六六】：「元史」，卷四，「世祖本紀」。
- 【註六七】：「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玉堂嘉話」，卷四。
- 【註六八】：「元史」，卷二〇六，「李璿傳」。
- 【註六九】：「宋史」，卷四七四，「賈似道傳」。
- 【註七〇】：「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中堂事記」中。
- 【註七一】：郝經「陵川集」〔「景印四庫全書珍本四集」本，商務印書館，民國六二年，台北〕，卷卅七。
- 【註七二】：同註七一。
- 【註七三】：「陵川集」，卷卅九。
- 【註七四】：「元史」，卷四，「世祖本紀」。

【註七五】：「元史」，卷八，「世祖本紀」。

【註七六】：「元史」，卷一二七，「伯顏傳」。又，「元文類」，卷十六，孟祺「賀平宋表」，略同。

【註七七】：「元文類」，卷十六，徐世隆「東昌路賀平宋表」。

【註七八】：劉敏中「平宋錄」（「叢書集成簡編」本，商務印書館，民國五五年六月，台北），卷中。

【註七九】：「元史」，卷九，「世祖本紀」。

【註八〇】：「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六，「玉堂嘉話」，卷四，「鹿庵先生江南平告天地文」。又，鹿庵先生即王磐，見「元史」卷一六〇「王磐傳」。

【註八一】：「元文類」，卷四八，王磐「江南平告太廟祝文」。又「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六，「玉堂嘉話」，卷四，「告太廟文」，略同。

【註八二】：「元文類」，卷十一，王磐「降封宋主爲瀛國公制」。又，「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六，「玉堂嘉話」，卷四，「瀛國公制辭」，略同。

【註八三】：「宋史」，卷四五一，「張珪傳」。

【註八四】：姚燹「牧菴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四年八月，台北），卷三十，「李德輝行狀」。

【註八五】：「元史」，卷一六九，「賀仁傑傳」。

【註八六】：「牧菴集」，卷十七，「賀仁傑神道碑」說：「行東川院者，則憲宗帶玉器械哈丹、庫哩濟蘇二人（按：即合剌、闊里吉思），先朝陟方乎此，拔將甘心。」

【註八七】：同註八四。

【註八八】：同註八三。

【註八九】：「元史」，卷一六七，「呂惑傳」。

【註九〇】：「元史」，卷十，「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正月條。

【註九一】：同註八五、八九、九十。

【註九二】：同註四九。

【註九三】：「元史新譜」，第二冊，第十一章第五節，頁二三四。

【註九四】：張森楷「合川縣志」（學生書局），卷卅七，「名宦」，「李德輝」條，夾註。

【註九五】：「釣魚城史實考察」，六，頁五七。